

从示证相关角度探析保安语中的 “确定/非确定语气”*

黎 皓

[提要] 本文从示证及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角度考察了保安语的“确定/非确定语气”，从语义、语用层面讨论了相关标记在保安语中的具体分布，分析得出保安语中系动词、存在动词以及系动词相关的时体标记系统区分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其完结体、结果体以及惯常体分别表达亲知、非亲知、陈实等示证意。

[关键词] 保安语 时体标记 示证 自我中心 非自我中心

一 引言

甘青语言区域^①中的保安语属蒙古语族语言，保安语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下文简称“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以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乡。甘肃、青海两地的保安语使用者分别为土族和保安族。据《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1998:397）记载，保安族自称“保安人”，由于历史原因，于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从青海同仁地区迁至甘肃积石山大河家境内。青海保安语和同仁当地的藏语有着长期持续的接触，而甘肃保安语在迁入大河家后则受当地汉语方言临夏话的影响较大。由于语言接触环境、文化、生活习俗的不同，两地保安语在语音、词汇和句法上逐渐形成差异。本文语料是笔者于2018年、2019年两次田野调查^②所得，均为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墩村^③保安语。

关于本文涉及的语言现象，过去学者们（详见下文）将其视为一种“语气”来讨论，但随着学界对类似现象在不同语言中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从示证性和亲涉性来讨论保安语中的“确定/不确定语气”将是一个新的视角。

* 本研究得到“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 Horizon 2020 (ERC-2019-AdG883700-TRAM)”的资助，并得到徐丹教授的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依据徐丹、贝罗贝（2018），甘青语言区域指甘肃、青海交界一带的区域，该区域内语言有：蒙古语族的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康家话、东部裕固语；汉语方言的临夏话、循化话和青海话及汉语变体的唐汪话、甘沟话和五屯话；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藏语安多方言；突厥语族的撒拉语、西部裕固语。

^② 发音合作人为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墩村村民马瑞先生（73岁）及长毛阿姑女士（73岁）。特此表示感谢。

^③ 下文中描写语言现象时，若无方言间的差异，则统一使用“保安语”。

二 甘青语言区域中“确定/非确定语气”的相关研究

根据刘照雄、林莲云(1980)，“确定/非确定语气”是说话人为了对其所叙述的内容进行判别而使用的一种语法手段，“确定语气”与说话人亲身经历或主观意愿直接相关，而“非确定语气”则与之相反，可用于表达转述或说话人非预期的态度或语气。这一现象在甘青一带的蒙古语族及突厥语族的一些语言中有所表现，其中论及的蒙古语族语言有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突厥语族语言有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在进一步的了解中，我们发现，学者们对甘青区域中该语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同中存异，同一时期的大多学者都将这一现象归入“语气”的范畴来讨论，并且都提及该现象和说话人自身对叙述内容的体会、认知相关。如说话人的直接经验、亲身经历或是主观意愿等，但学者们针对这一类“语气”所使用的术语各有不同。除了已经提到的“确定/非确定语气”，清格尔泰(1981)，陈乃雄(1987:249-270)及保朝鲁、贾拉森(1991:296)在描写土族语、保安语和东部裕固语时使用了“主/客观语气”，照那斯图(1981:53)使用了“判断语气”；在描写西部裕固语时，陈宗振(1998)建议使用“确切/普通口气”，而钟进文(2009:138)则使用了“直陈式”和“间陈式”。在保安语相关的描写中，陈乃雄(1987:261)认为“确定/非确定语气”这一术语并不能完全概括该语言现象的实际情况，如在一些和说话人自身经验或预期并无关系的表达中，说话人仍然选择了“确定语气”，而在一些说话人亲身经历相关的表达中，如“辣椒好辣”“我的脊背痛”等，说话人却选择了“非确定语气”。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同时也观察到这一语言现象与人称、时体、语义、语用等语法范畴有不同程度的联系。Slater(2005:194)在描写民和土族语时采用了清格尔泰的“主/客观语气”这一术语，认为土族语中的“主/客观语气”标记事实上和说话人自身在其表述中所期望的自我参与度有关。而Dwyer(2000)在讨论撒拉语中的相关现象时则从示证的角度将说话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加以区别，分为和视听等感知相关的直接信息源和传闻推断等相关的间接信息源来描写。事实上，在先行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相关标记二分对立的特点，但并未从参与度、可控性等语义、语用角度对标记的分布进行分析。此外，在先前保安语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完整体过去时的两个标记-tch、-o所表达的语法信息存在不同的看法：布和、刘照雄(1982:43)认为完整体过去时-tch为非确定过去时，而-o为确定过去时，而陈乃雄(1987:191)则认为标记-tch更加表达一种“状态的转换”。本文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结合具体的语言事实，从示证性(evidentiality)和亲涉性(egophoricity)的角度对甘肃保安语中的相关现象作进一步的描写和分析。

三 示证与亲涉

示证是标记信息来源的语法范畴(Aikhenvald 2004)。Hill & Gawne(2017)认为这一定义略显简要，其在文中征引了Tournadre & LaPolla(2014)的定义，认为示证是根据说话人的视角及策略来表达信息来源和信息传递的语法范畴，并指出信息的传递(access to information)和说话人视角(speaker's perspective)的补充目的在于揭示人称示证(personal evidentiality)的隐约之处。Tournadre(1992)首次提出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égophorique/hétérophorique)这一术语，近年来在相关讨论中被广泛应用。自我中心表达说话人的个人知

识或意愿，通常和说话人直接参与的事件相关 (Tournadre & Dorje 2003)。在最近的研究中，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对立被描述为一种亲涉 (egophoricity) 现象。San Roque et al. (2018) 梳理了过往不同语言研究中对相关现象的讨论，并探讨了分布区域及影响标记分布的语义因素等。根据他们的定义，广泛来看，亲涉性 (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 是语言学意义上用来标引个人知识、经验或自我意识参与的普遍现象，但严格来讲，亲涉性是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或情境中对潜在说话人 (第一知情人) 的个人知识或参与进行语法编码的系统。关于示证和亲涉的范畴等级问题有不少讨论，但学界似乎还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有学者将亲涉作为示证范畴的下位层次 (subcategory)，而有部分学者认为自我中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 (Widmer 2017, 2020)。Aikhenvald (2004) 认为与自我中心相关的这一现象是一种示证策略 (evidential strategy)，即从本身并没有示证含义的语法范畴或形式中获得与信息来源相关的次要含义。邵明园 (2014) 认为自我中心并非典型的示证形式，其主要功能在于传达说话人的视角和人的能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中心不具有标记信息源的功能，从这一层面来看，应当将其视为一种“类示证”或“弱示证”。而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和自我中心相关的语法标记似乎表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如在藏语拉萨话中，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一些语言中，作为示证系统中的子类，自我中心通常和其他示证标记相互对立 (Tournadre 2008; San Roque & Loughnane 2012)；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如加德满都的尼瓦尔语中，其形态范式表现出二分的特征，如在过去时中，后缀 -ā 和自我中心相关，而后缀 -a 和非自我中心相关 (Hale 1980)。Widmer (2020) 指出二元对立的自我中心系统对示证方式提出了挑战，如果将自我中心标记视作示证系统中的一类，如参与示证 (participatory evidence)，那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就在于很难对自我中心对立的非自我中心给予充分的描写。在保安语中，我们注意到在系动词、存在动词以及和系动词相关的时体标记中，像加德满都的尼瓦尔语一样，存在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对立，而在其他时体标记中则可能和亲知、非亲知、意外、陈实等示证义相关。

四 相关的语义特征

(一) 参与度

Creissels (2008) 在讨论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时，提出断言者参与标记 (assertor's involvement marking)。他认为，事实上这类标记和说话人在话语内容中的参与度相关。Widmer & Zúñiga (2017) 进一步细分了参与 (involvement) 这一概念，将其划分为行为参与 (actional involvement) 和认识参与 (epistemic involvement)。在与前者相关的情境中，说话人对自己直接参与的事件信息具有优先传递 (privilege access)，而对于后者，说话人则对已经提前获知的事件信息优先传递。请参见保安语例句^①：

^① 语法标注：1 (first person 第一人称)，2 (second person 第二人称)，3 (third person 第三人称)，SG (singular 单数)，ACC (accusative 宾格)，IPFV (imperfective 非完整体)，PFV (perfective 完整体)，EGO (egophoric 自我中心)，NEGO (non egophoric 非自我中心)，ABL (ablative 比格)，GEN (genitive 属格)，LOC (locative 地点格)，VZR (verbalizer 动词化标记)，NZR (nominalizer 名物化标记)，COP (copule 系词)，EXIST (existential 存在动词)，PTCP (participle 分词)，CVB (converb 副动词)，INTER (interrogative 疑问)，RES (resultative 结果体)，TER (terminative 完结体)，HAB (habitif 惯常体)，DUR (duratif 延续体)，PROG (progressive 将行体)，DIR (direct 亲知)，INDIR (indirect 非亲知)，MIR (mirative 新异)，FAC (factuel 陈实)，AUX (auxiliary 助动词)，QUOT (quotative 引述)。

- (1) pu maqa-nə ntə-tɕ-i. 我吃肉呢。
1.SG 肉-ACC 吃-IPFV.DUR-AUX.EGO
- (2) a. ntɕaŋ rə-tɕ-i. 他来了(还在路上)。
3.SG 来-IPFV.DUR-AUX.EGO
- b. ntɕaŋ rə-tɕ-o. 他来了(还在路上)。
3.SG 来-IPFV.DUR-AUX.NEGO

在例(1)中,说话人本身为事件的参与者,在这一情形中自我中心标记为默认选择。但在例(2)中,说话人提前获取事件相关的信息,在例(2a)中,说话人使用自我中心标记传递出对话语内容的权威性,表现出高参与度;而在例(2b)中,说话人使用非自我中心标记表达对事件信息的不确定性,表现出低参与度,并有意避免对话语信息的可靠性承担责任。

(二) 可控/不可控

Hargreaves(2005)在讨论尼瓦尔语的相关现象时,将动词分为3种类型:可控动词(control verb)、不可控动词(noncontrol verb)和可变动词(fluid verb)。可控动词用以描述自主(self-initiated)行为,不可控动词用来表现与自主行为不兼容的动作,可变动词则处于可控动词和不可控动词之间,需要具体情境来解读其可控或不可控。对于具有自主意识的可控动词而言,当它和第一人称同时出现在句子中时,一般使用自我中心标记,但如果语义层面的第一人称主语是一个感受者(experiencer),无法主动支配,如表喜爱或疼痛等知觉感觉时,则需要非自我中心标记。在保安语中,我们找到以下例证:

- (3) pu suāne-nə ntə-tɕ-i ki ntə tɕi-si khel
1.SG 酸奶-ACC 吃-IPFV.DUR-AUX.EGO NEG 吃 去-CVB 肚子
tɕhur-tɕ-o. 我不吃酸奶,吃酸奶的话会拉肚子。
淌-IPFV.DUR-AUX.NEGO
- (4) pu thə məsku-nə ŋka-kə-tɕ-o. 我喜欢那件衣服。
1.SG 那 衣服-ACC 喜欢-VZR-IPFV.DUR-AUX.NEGO
- (5) mənə kaphu ethə-tɕ-o. 我的脊背痛。
1.SG.GEN 脊背 痛-IPFV.DUR-AUX.NEGO
- (6) mənə aməŋ-nə thəle-tɕ-o. 我的嘴好辣。
1.SG.GEN 嘴-ACC 辣-IPFV.DUR-AUX.NEGO

在例(3)的前半句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说话人所叙述的内容和认识参与相关,表现出高参与度;其次,吃这一动词本身具有自主意识,即可控动词,因此,此处使用自我中心标记,但在后半句中表达不可控行为时,说话人则使用了非自我中心标记。而在例(4)(5)(6)中有表达喜欢、痛、辣等不可控的感知动词时,说话人同样使用了非自我中心标记。

(三) 有意向/无意向

意向性(intentionality)影响过去时完整体-tɕh和-o的分布。当一个动作或事件依照说话人的意向发生时,即发生在说话人计划之内,一般使用标记-o;而这一动作或事件在说话人无意识的状态下,或偶然发生,则使用标记-tɕh。例如:

- (7) pu u-saŋ oloŋ olə-tɕh. 我喝多了。
1.SG 喝-PFV.PTCP 多 成为-PFV.RES

- (8) pu u-saŋ oloŋ ol (ə)-o. 我多喝了。
 1.SG 喝-PFV.PTCP 多 成为-PFV.TER

例(7)中,动作的结果发生在说话人意料之外,是不在其意向内的,而在使用标记-o时,则表明这一行为是在说话人预料之中发生的。

五 示证及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标记的分布

根据布和、刘照雄(1982)和陈乃雄(1987),保安语表示判断和存在的助动词既可以出现在体词后,也可以出现在谓词后,且严格区分“确定/不确定语气”。为了明晰该类词的不同功能,我们将出现在体词后表判断或存在的情况分别界定为系动词和存在动词,将以后缀形式附着在动词后的情况界定为助动词。保安语中“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对立见于系动词、存在动词、部分限定动词构成的主谓句,以及引语句中。下面我们通过具体语料来分析保安语中示证及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标记的分布情况。

(一) 系动词、存在动词与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标记的分布

保安语的系动词、存在动词各有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除了存在动词的否定形式外,其他每个形式的系动词和存在动词区分自我中心和非自我中心,总结如表1:

表1 甘肃保安语中的系动词、存在动词

词类	式范畴	自我中心	非自我中心
系动词	肯定	ji	o
	否定	ei	eo
存在动词	肯定	wi	wa
	否定	ki/kinə	ki/kinə

由系动词和存在动词构成的陈述句中,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对立分布如下:

- (9) pu loŋi ji ntɕaŋ te loŋi o
 1.SG 老师 COP.EGO 3.SG 也 老师 COP.EGO
 tɕh ɛyeŋen o.
 2.SG 学生 COP.NEGO 我是老师,他也是老师,你是学生。
- (10) almaŋ-nə tɕhi ntə-saŋ mpou? 苹果是你吃的吗?
 苹果-ACC 2.SG 吃-PTCP INTER
 pu ei ntɕaŋ o. 不是我,是他。
 1.SG COP.NEG.EGO 3.SG COP.NEGO
- (11) thə loŋi mpou? 那位是老师吗?
 那 老师 INTER
 ntɕaŋ eo pu ji. 他不是,我是。
 3.SG COP.NEG.NEGO 1.SG COP.EGO
- (12) nə khətə khuŋ wou? 家里有人在吗?
 这 家.LOC 人 INTER

- a. *khuj wi.* 有人在。
人 EXIST.EGO
- b. *khuj wa.* 有人在。
人 EXIST.NEGO
- (13) *mənə su eile-tə ki ~ kinə.* 桌子上没有我的书。
1SG.GEN 书 桌子-LOC EXIST.EGO ~ NEG

在例(9)(10)(11)中,我们观察到自我中心和第一人称似乎具有人称一致的关系,但保安语中的人称和自我中心并不存在搭配。事实上,二者之间看似有搭配关系的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参与度来解释的。在系动词构成的主谓句中,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说话人表现出充分的认识参与,因而选择自我中心标记这一形式。在例(12)中,参与度仍是说话人选择自我中心或非自我中心标记较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在这一例子中我们尝试给出一个问答相关的话语情境,假设A站在门外询问该户人家家中是否有人,如果答者在门内,直接参与了问题内容相关的事件,在这一情景中自然选择自我中心形式,即例(12a);但如果答者在门外,如路过的邻居,其本身不直接参与问题内容相关的事件,那答者会选择非自我中心的形式,即例(12b)。需要说明的是,甘肃保安语中存在动词的否定形式较为特殊,虽有*ki/kinə*两个形态,但事实上不区分自我和非自我,如例(13)。但根据文献来看,青海保安语以及土族语是有自我非自我区分的(陈乃雄 1987;清格尔泰 1981)。

保安语中,表达判断、存在的一般疑问句不区分自我和非自我,但在特殊疑问句有例证表明是存在区分的。例如:

- (14) *ṭchi khaŋ ji?* 你是谁?
2SG 谁 COP.EGO
- (15) *thə khaŋ khaŋ o?* 那人是谁?
那 人 谁 COP.NEGO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分布和人称以及句子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性,即在陈述句中第一人称和自我中心相关,而在问句中与第二人称相关。这一特征在一些文献中被认为是一种默认分布(San Roque et al. 2018; Widmer & Zúñiga 2017)。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意味着语法意义上的一致关系。下面这些例外分布将佐证这一观点:

- (16) *pu ṭchi-si oloŋ o.* 我比你老。
1SG 2SG-ABL 老 COP.NEGO
- (17) *ṭchi nṭcaŋ-si oloŋ o.* 你比他老。
2SG 3SG-ABL 老 COP.NEGO
- (18) *nṭcaŋ pu-si oloŋ o.* 他比我老。
3SG 1SG-ABL 老 COP.NEGO
- (19) *nṭcaŋ loŋi ci.* 他不是老师。
3SG 老师 COP.NEG.EGO
- (20) *nṭcaŋ loŋi co.* 他不是老师。
3SG 老师 COP.NEG.NEGO

在保安语中,通常说话人在陈述事实相关的内容时,会选择非自我中心,如例(16)-(18)。这是由于事实具有客观性,而自我中心的个人参与度高于非自我中心,伴随着较强的

主观意识，因此非自我中心更符合说话人表达逻辑。在例（19）中，当说话人使用自我中心形式 *ci* 时，该语句表达个人主观意愿上的判断，而在例（20）中，使用非自我中心标记时，则强调该话语内容与事实相关。需要补充的是，在保安语中，当回答是非问句时使用的肯定词也区分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它们分别是 *mpi* (EGO)/*mpa* (NEGO):

- (21) *ntɕaŋ khal-saŋ mpi.* 他说的对。
 3SG 说-PFV.PTCP 对.EGO
- (22) *ntɕaŋ khal-saŋ mpa.* 他说的对。
 3SG 说-PFV.PTCP 对.NEGO

例（21）（22）区别在于，使用自我中心时，说话人有明确的个人参与，为“他”所说的内容证明，而使用非自我中心时，则更倾向于一种表态，不强调个人参与，避免对“他”所说的内容负责。

（二）限定动词与示证及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分布

在保安语中，由限定动词构成的句子参与时体^①及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变化，可通过附加后缀的方式来实现。保安语的时范畴可以分为过去时和非过去时，而体范畴可分为完整体和非完整体，又可细分为完结体、结果体、惯常体、延续体及将行体。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保安语时体标记

时范畴	体范畴		标记	示证义
过去时	完整体	完结体	-o	亲知
		结果体	-tɕh	非亲知、意外
非过去时	非完整体	惯常体	-nə	陈实
			-m	
		延续体	-tɕ-i	自我
			-tɕ-o	非自我
		将行体	-k-i	自我
			-k-o	非自我

可以观察到，在保安语中，系动词 *-ji/-o* 作助动词和时体标记共同构成延续体和将行体，这两套体标记同系动词和存在动词一样较为系统地地区分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而过去时完结体、结果体以及非过去时将行体则为单独的时体标记。布和、刘照雄（1982）将 *-o/-tɕh* 界定为确定/非确定过去时，将 *-m/-nə* 界定为确定/非确定现在时，这种分法虽然遵从了系动词和存在动词二分的方式，但从具体的语义来看，是否可以将这两组标记以二元的方式对立区分，似乎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说明。

1. 过去时

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后缀 *-o* 和 *-tɕh* 用来标记发生在过去的完整体事件。完结体标记 *-o* 在句中标记说话人亲见亲闻亲历的事件，强调信息来源，相比于自我中心，更符合亲知这一示证意。例如：

^① 保安语中没有明确的“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等“时范畴”，但可按“过去”“非过去”的时间概念分成“过去时”“非过去时”。

(23) maroŋ-tə khuŋ-kə thutɕir-tɕh lo-kə (t)o.有人溺水在黄河里,被捞了上来。
黄河-LOC 人-SG 淌-PFV.RES 捞-VZR PFV.TER.DIR

(24) tɕh khal-o. (是)你说的。
2SG 说-PFV.TER.DIR

而 -tɕh 则为非亲知标记,同时可用于表达意外或令人感到惊讶的情形,可视作新异(mirative)标记。例如:

(25) ntɕaŋ ju-tɕh. 他走了。
3SG 走-PFV.RES.INDIR

(26) pu rə-tɕh. 我来了。
1SG 来-PFV.RES.MIR

(27) ntɕaŋ maqa-nə ntə-tɕh. 他把肉给吃了。
1SG 肉-ACC 吃-PFV.RES.MIR

例(23)(24)分别表示话语内容相关的信息曾是说话人亲自目睹或亲耳听见所得。例(25)中,当说话人使用非亲知标记时,说明该信息并非其本人亲闻亲见所得,具有转述之意。例(26)中,听话人不知道说话人“要来”这一信息,而说话人本身使用这一标记弱化了其参与感。而在例(27)中表现出说话人对事件发生感到意外,即对说话人而言是不在预期之内。

2. 非过去时

非过去时惯常体标记 -m/-nə 同样以二分的方式被界定为现在确定时和非确定现在时,但两种形式区别不大(布和、刘照雄 1982)。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m 一般用来表示普遍真理或事实陈述,而 -nə 在陈述已知事实时可具有推测的含义,两者在一些情况下可互换。从示证的角度,我们认为 -mə 和 -nə 符合陈实(factual)的含义。请参看以下例句:

(28) pu χəte katɕhi matə-m~nə. 我会说汉语。
1SG 汉 话 知道-IPFV.HAB.FAC

(29) nə noqui khuŋ-nə tɕu-m. 这狗会咬人。
这 狗 人-ACC 咬-IPFV.HAB.FAC

(30) nə noqui khuŋ-nə tɕu-nə. 这狗会咬人(推测)。
这 狗 人-ACC 咬-IPFV.HAB.FAC

在例(28)中,后缀 -m 和 -nə 不存在区别,但在例(29)中,后缀 -m 用来强调事实,而例(30)则是基于常识或者事实的推测,更像一种警示或提醒。

我们已经提到非过去时中的延续体和将行体由体标记和助动词共同构成,系统区分自我中心和非自我中心。和系动词、存在动词一样,自我中心相关的标记和第一人称有较高度度的关联,但不具有语法意义上的一致性。在不可控的或说话人非直接参与的事件中,以及说话人对话语内容的可靠性不承担责任时,使用非自我中心标记。例如:

(31) pu ŋka le-ku le-kə-tɕ-i. 我做好多活。
1SG 多 做-NZR 做-VZR-IPFV.DUR-AUX.EGO

(32) pu thənə ap-k-i. 我(要)带走那个。
1SG 那个 拿-IPFV.PROG-AUX.EGO

(33) tɕh rə-si pu pesi-tɕ-o. 如果你来,我很高兴。
2SG 来-CVB 1SG 高兴-IPFV.DUR-AUX.NEGO

- (34) pu la-k-o. 我要哭了。
1SG 哭-IPFV.PROG-AUX.NEGO

在无人称句中通常使用非自我中心标记。例如：

- (35) kər-tə mu ta-tɕ-o. 房间里有臭味。
房子-LOC 臭 能-IPFV.DUR-AUX.NEGO

- (36) thosoŋ-nə khi-tɕ-o. 把油倒上。
油-ACC 倒-IPFV.DUR-AUX.NEGO

- (37) maqa-nə ntə-tɕ-o. 吃肉呢。
肉-ACC 吃-IPFV.DUR-AUX.NEGO

3. 引语句标记与体、示证

在保安语中，引语句可由实意动词 *khal* “说”和虚化了的言说动词 *kə* 引导，通常置于句末，二者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kə* 应当来自共同蒙古语中的动词 **kee*（参见 Nugteren 2011:408），其原义为“说”。在今天的保安语中，*kə* 以后缀形式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后充当话题标记，或出现在句末以充当引语标记，也可同 *simukə*，*skute* “想”、*asχə* “问”等动词合用以表达所思所想。*kə* 做引语标记时可接缀延续体标记，其形态形式为 *kə-tɕ-i/kə-tɕ-o*。根据陈乃雄（1987:246），在青海保安语年都乎方言中，其词干部分常被省略，通常以 *tɕ-i* 或 *tɕ-o* 的形式出现。我们观察到，甘肃保安语的 *kə-tɕ-o* 常单独出现在句末，而 *kə-tɕ-i* 出现时往往需要“说”“想”“问”等动词的伴随。例如：

- (38) ntɕaŋ linxia-si r(ə)-o kətɕi khal-tɕ-o. 他₁说他₂从临夏来的。
3SG 临夏-ABL 来-PFV.TER QUOT.EGO 说-IPFV.DUR-AUX.NEGO

- (39) ntɕaŋ linxia-si r(ə)-o kətɕo. 听说他是从临夏来的。
3SG 临夏-ABL 来-PFV.TER QUOT.NEGO

例（38）中，引语标记 *kə* 后接缀自我形式时，原说话人（他₁）和施动者（他₂）为共指关系，引语中的施动者即为消息来源。而例（39）中，当引语标记 *kə* 接缀非自我形式时，消息来源不再和引语中的施动者有关，于说话人而言，其所引述的内容为二手消息。

六 结 语

根据 Brosig & Skribnik（2018），在中世纪蒙古语中有 3 个示证标记，且仅存在于过去时中：陈实示证 *-bA*，亲知示证 *-IUGA* 以及非亲知示证 *-JUGU*。而在现代蒙古语喀尔喀方言中，过去时标记 *-laa* 为亲知示证，*-jee* 为非亲知示证（Brosig 2018）。此外，小泽重男（1965）指出中世纪蒙古语中 *a-*、*bü-* 表示“有、存在”意义的动词具有“主、客观”的对立。其后，那顺乌日图（1990）在相关讨论中推断保安语和土族语系词的“主/客观语气”的对立与这两个特殊动词有关。从区域分布来看，甘青语言区域中的土族语、康家语、撒拉语、五屯话都发展出“自我中心/非自我中心”的对立。对比该区域中没有发展出这一系统的东乡语，我们发现这些语言都和具有丰富示证系统的藏语安多方言有密切的接触。

结合以上材料，我们认为中世纪蒙古语中，有关示证和“主、客观”的语法表现为保安语发展出示证及亲涉系统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和藏语安多方言的密切接触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语法范畴在系动词、存在动词及引语等多个语法范畴中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保朝鲁、贾拉森. 1991. 《东部裕固语和蒙古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 布和、刘照雄. 1982. 《保安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陈乃雄. 1987. 《保安语和蒙古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4] 陈宗振. 1998. 《关于西部裕固语系动词的“口气”》，《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 [5]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8.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 [6] 刘照雄、林莲云. 1980. 《保安语和撒拉语里的确定与非确定语气》，《民族语文》第3期.
- [7] 那顺乌日图. 1990. 《中世纪蒙古语 a-、bü- 及其演变》，《民族语文》第4期.
- [8] 清格尔泰. 1981. 《蒙古语（土族语）动词特点——以表示语气的 i:~a 助动词的对立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
- [9] 邵明园. 2014. 《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 徐丹、贝罗贝. 2018. 《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汉语学报》第3期.
- [11]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钟进文. 2009. 《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3] 小泽重男. 1965. Auxiliary verb a- and bü- in Middle Mongolian: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ememes. 东京外国语大学论集 (Area and Culture Studies), 12:91-113.
- [14]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Brosig, Benjamin & Elena Skribnik. 2018. Evidentiality in Mongolic. In Alexandra Aikhenval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Brosig, Benjamin. 2018. Factual vs. evidential? The past tense forms of spoken Khalkha Mongolian. In Ad Foolen, Helen de Hoop & Gijs Mulder (eds.), *Evidence for Evidentiality*, pp.45-7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7] Creissels, Denis. 2008. Remarks on so-called conjunct/disjunct system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synta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II. Berlin, 25-28 September.
- [18] Dwyer, Arienne. 2000. Direct and indirect experience in Salar. In Bo Utas & Lars Johanson (eds.), *Evidentials. Turkic, Iranian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pp. 45-5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9] Hale, Austin. 1980. Person markers: Finite conjunct and disjunct verb forms in Newari. In Robert Trail et al. (eds.), *Papers in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pp. 95-106.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20] Hargreaves, David. 2005. Agency and intentional action in Kathmandu Newar. *Himalayan Linguistics*, No.5:1-48.
- [21] Hill, Nathan W. & Lauren Gawne. 2017. The contribution of tibetan languages to the study of evidentiality. In W. Nathan & Lauren Gawne (eds.), *Evidential Systems of Tibetan Languages*, pp.1-38.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22] Nugteren, Hans. 2011. *Mongolic Phonology and the Qinghai-Gansu Languages*, Leide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23] San Roque, Lila & Loughnane Robyn. 2012.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evidentiality area. *Linguistic Typology*, 1:111-167.

- [24] San Roque, Lila, Simeon Floyd & Elisabeth Norecliffe. 2018. *Egophoricity: An Introdu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5] Slater, Keith W. 2005.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26] Tournadre, Nicolas. 1992. La déixis en tibétain: quelques faits remarquables. In Mary-Annick Morel et Laurent Danon-Boileau (éds.), *La Deixis*, pp.197-208.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27] Tournadre, Nicolas & Randy J. LaPolla. 2014.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evidentiality: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37, No.2: 240-263.
- [28] Tournadre, Nicolas & Sangda Dorje. 2003. *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 [29] Tournadre, Nicolas. 2008. Argument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conjunct’/‘disjunct’ in Tibetan. In B. Huber, M. Volkart & P. Widmer (eds.), *Chomolangma, Demawend und Kasbek: Festschrift für Rolan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 pp. 281-308. Halle/Saa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 [30] Widmer, Manuel & Fernando Zúñiga. 2017. Egophoricity, involvement, and semantic role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pen Linguistics*, 3(1): 419-441.
- [31] Widmer, Manuel. 2020.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phoricity and evidentiality. In H. Bergqvist & S. Kittilä (éds.), *Evidentiality, Egophoricity and Engagement*, pp.263-287.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An Exploration of “Certain vs. Uncertain Mood” in Bao’an from the Evidential Perspective

LI Hao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labeled “certain vs. uncertain mood” by Liu Zhaoxiong & Lin Lianyun (1980) in discussing the Bao’an language of the Gansu-Qinghai linguistic area. It is explored here through the lens of evidentiality and egophoricity. The distribution of related markers in Bao’an is discussed at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levels. Our analysis shows a binary egophoric system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copula, the existential verb, as well as the durative and progressive markers of the copula, while the resultative, terminative, and habitual markers can be better explained as expressing direct, indirect, and factual evidentials.

[Keywords] Bao’an language tense and aspect markers evidential egophoric non-egophoric

(通信地址: 75007 巴黎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